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與安全政策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Policy Shifts-Poland's Security Environment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doi:10.30390/ISC.200406_43(3).0003

問題與研究, 43(3), 2004

Issues & Studies, 43(3), 2004

作者/Author：楊三億(San-Yi Yang)

頁數/Page：49-7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6_43\(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6_43(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波蘭後冷戰時期的認同轉變 與安全政策*

楊 三 億

(華沙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安全政策的擬定是波蘭自一九八九年「民主化」與「非共化」以後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支柱，此一支柱突顯了波蘭國內政治發展與向外尋求安全的特色，並同時表現在波蘭追求安全環境時所展現的決心。從要素分析面向來看，波蘭安全政策的擬定受到以下諸面向的影響：包括關於傳統歷史文化、物質因素限制、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等考量。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影響波蘭安全認同的內外要項，並且經由波蘭特有的認知方式加以解讀，以及做出反應。過去關於中東歐地區安全的研究文獻多半集中在權力平衡的分析方式，本文則嘗試從波蘭安全研究的動機面向出發，企圖藉理解波蘭人對認同轉變與安全概念的變化來了解波蘭安全政策的變遷，並試圖解釋波蘭在面對環境發生變動時採取的因應之道，以及預測未來的可能發展。本文擇波蘭於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安全認同的轉變、加入歐盟與美歐分裂等三大主軸進行分析。本文發現，因認同轉變導致政策變遷的過程發生在波蘭民主化的轉形期與加入歐盟的過程中，但面臨「盟友間的分裂」，波蘭政府卻被迫必須在二擇一的情況下表明立場，此一「非此即彼」的政策選擇導致波蘭政府的安全政策重新向「高政治」、「硬安全」的面向擺盪，先前因為安全認同轉變所凝聚的共識暫時受到擱置，本文企望藉由觀照現實主義分析面向之餘，同時還能提供另一種新的分析方式。

關鍵詞：安全認同、認知學習、安全環境、安全政策

* * *

* 作者在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相關見解與寶貴之修正意見。



壹、前言：安全研究的分析方式與安全認同研究

一、安全研究的分析方式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作為前蘇聯東歐共黨衛星國家之一的波蘭開始進行民主化與非共化的改革以來，波蘭的國內政治改革與對外關係的安全政策擬定對歐洲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種影響來自於下列幾個方面：首先是作為骨牌效應起點的波蘭圓桌談判不僅是華沙當局的國內事件，同時也經由示範效應的影響把民主化與非共化兩大力量向外延伸至其他鄰近的中東歐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海三國和東南歐國家等；其次，民主化與非共化對歐洲安全的影響還更來自於這些重新解放的國家對安全觀念的重新塑造，也就是對國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以及重新建立新的安全認同；再其次，新的安全認同對已經準備重新加入歐洲家庭的波蘭來說，將無可避免的衝擊歐洲安全架構。

目前學界對安全研究的分析方式可概略區分為以下幾種途徑：現實主義（realist）、安全建制（security regimes）與安全社群（security communities）。^①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對於權力的爭奪、物質因素的影響，同時把個人與文化、認知因素置於次要的或隱性的地位；安全建制則放大了對原先被丟棄在一旁的規範性因素，重新審視這些規範性因素對國際安全的影響；而安全社群論者企圖把政治精英如何逐步形成集體認同藉以消弭戰爭的手段，以建造安全社群的模式（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s）表述出來。上述研究途徑各有所長，現實主義途徑長於對國家，尤其是強權對外行為的一般性描述，雖然現實主義無法說明何時、何地、某個特殊國家會採取何種外交決策，但現實主義提供的一套研究典範卻是任何決策精英不可偏廢的首要考慮目標。現實主義可能無法解釋若干特殊國家的「偏差」行為（如希特勒二次戰後末期堅持耗費大量資源用以屠殺猶太人，古巴在失去強國奧援後仍然堅守反美外交），但

註① 此處所言現實主義途徑包括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平衡與結構限制因素；安全建制途徑則突出制度因素影響，說明行為者如何在原則、信念、規則與決策程序影響過程中行為漸趨一致；而安全社群途徑則直接將我們所認知到的權力、結構、制度、原則、信念等獨立出來，成為理解的主體而非工具性手段，並在這個架構下討論行為者如何認知，以及如何進行社會化過程。這些研究途徑與歐洲和中東歐安全研究相關的代表性文章如：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Summer 1990), pp. 5~56; Elke Krahnemann,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1 (March 2003), pp. 5~26; 以及 Emanuel Adler, "Seeds of Peaceful Change: the OSCE's 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9~160; Laszlo J. Kis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Foreign Policy Review* (Budapest), Vol. 2, No. 1 (2003), pp. 115~130; Ronald D. Asmu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an Age of New Uncertainty,"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Vol. 4, No. 1 (Spring 2003), pp. 6~15.

現實主義者認為這些偏差將有如曇花一現，國際政治將透過權力平衡或結構力量的方式除去這些偏差行為。同樣的，安全建制的研究也提供安全研究一項不同於現實主義的研究面向，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在現實主義式的歐洲安全研究架構下並沒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倡議安全建制論者卻看到了冷戰結束，歐安組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在冷戰時期籌建的軍事安全建制依然持續保存，這些組織能夠保留下來的主要原因，部分學者認為肇因相關的國際行為者反對改變現狀（如俄羅斯認為歐安組織的存在能夠讓俄國持續發揮影響力，美國認為北約依然扮演美國對歐安全政策的重要基石，既有的安全建制所強調的規範性原則有助於和平的穩固等），因此，由霸權所設計的安全建制，霸權當然願意支持建制持續發揮功能。^②最後，安全社群論者著重國家間的共識建構，安全社群的說法是，如果國家可以整合在一個社群概念之下，並造就了他們不以武力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處在社群的國家不僅形成了穩定的秩序，並且事實上也形成了穩定的和平，社群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由內而外構築國際安全的穩固模式（inside-out model）。^③

上述所說這些安全研究的途徑各具所長，企圖描述解釋的對象也有各有所異，筆者很難對這些研究途徑做一個立竿見影的優劣評比。不過本文重點聚焦於波蘭一九八九年民主化與非共化以後的安全政策，迄今僅約十餘年之久，但波蘭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變動之大，卻又遠勝於波蘭受制於共產統治的四十餘年；同時，波蘭的安全政策轉變，無論在國防武力的重新整建、國防戰略的重新擬定、國家利益的重新建構，以及民族認同與泛歐認同（pan-European identity）的重新融合上，都突顯了一種有別於單一指令性的共產主義思想，甚且共產思想本身亦成為波蘭追求與西方整合過程中的部分基石。也因此，如果要能夠深刻勾勒出波蘭近年來安全政策轉變的若干因素，就不能排除影響波蘭安全政策甚鉅的利益取向與認同取向探討。前者著重於相對獲得與絕對獲得的討論，現實主義者與制度主義者著重在國家間相對獲得與絕對獲得的討論，^④在波蘭的安全研究上，波蘭處理對友好國家（如歐盟會員國）與非友好國家時（如波蘭東鄰）的安全政策就面臨此一問題。波蘭入盟談判過程中，波蘭必須付出多少代價與可以從中獲得多少利益是決定波蘭是否加入歐盟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在面臨入盟談判過程引發與波蘭東部鄰國間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調整過程也無可避免的會連帶影響波蘭的整體利益評估。但是理解波蘭的安全政策又不能僅僅從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的確，波蘭加入歐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除了每年固定

註② Elke Krahnemann,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op. cit.*, p. 9.

註③ Emanuel Adler, "Seeds of Peaceful Change: the OSCE's 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 *op. cit.*, pp. 119~120.

註④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April 1991), pp. 336~366; Joseph M.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1~339.

的財政支出外，波蘭還需要採納歐盟的條約、法律與規定，採行這些西方先進國家的標準初期將可能會造成波蘭經濟體質在短時間內出現重大改變，此種改變若操作不當將可能使波蘭市場經濟遭受損失，更可能重創目前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因此如果不一項具有高度內部共識，且波蘭國內左右政黨一致同意的歐盟政策，波蘭的入盟談判尚在未定之天。換句話說，除考量短期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外，著眼於中長期的政治穩定、安全環境與未來發展更是波蘭政府考量安全政策所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波蘭如何評估未來歐洲安全的走向以及如何重新理解波蘭國家利益的基礎，和波蘭人如何重新建構本身認同有極大的關係，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認同取向。^⑤因此，本文在同時處理利益取向與認知取向的前提下，著重解釋因為安全認同轉變而引發的波蘭安全政策變遷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

二、安全認同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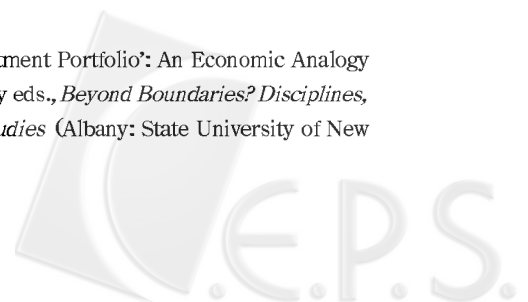
認同是一種關係的結構，從這個角度出發，個人關照外界（人或制度）的愛好成爲一種愛的目標（love objects），而相反的對他人的憎惡則變成侵略的目標（objects of aggression）。^⑥認同同時也可以是關於群我大小間的對比狀態，認同可以出現在個人之間，也可以出現在群體之間，出現在個人之間稱爲個人認同，出現在群體之間則稱爲集體認同，前者主要著重在解釋個人如何習慣他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說明社會的特徵與模式是如何的添加到他個人的認同之上；相對的，出現在群體之間稱爲集體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或安全認同屬於集體認同的範疇，集體認同可以解釋個別集體如何參照在其他集體的行動下，而產生該個別集體的社會行動。^⑦不同個人或集體間的認同狀態並非恆久固定的，個人或集體會因爲社會地位的差異而出現認同混亂，在混亂的過程中，處於劣勢的個人或集體可以透過若干方式調整自己的社會地位或認同感藉此消除認同差異。^⑧此種調整自我的社會地位或社會認同有以下幾項途徑：其中一項就是可以透過社會動員的方式（例如更加努力工作賺取個人或集體的利潤）以求加入更高一級的社會地位；其次，較低一級團體或個人也可以選擇不加入其它更高一級的社會團體，他們可以採行競爭的方式，重新塑造出新的社會地位；最後，較低社會地位的個人或團體也可以選擇故步自封的方式（採取阿Q心態），切斷

註⑤ Rodney Bruce Hall,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y—Social Construct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7.

註⑥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6.

註⑦ Hall,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y*, p. 37.

註⑧ Tadashi Anno, "Collective Identity as an 'Emotional Investment Portfolio': An Economic Analogy to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Rudra Sil and Eileen Doherty eds., *Beyond Boundaries? Disciplines,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p. 117~141.



與外界隔絕以減低因社會地位差距所帶來的混亂。^⑨就波蘭安全研究的面向而言，安全認同的主要關心聚焦在波蘭人對安全概念的理解、對尋求安全解決途徑之道、以及重新調整對威脅來源的認知等諸面向進行分析，藉以尋求波蘭對安全認知為何產生變遷，以及產生變遷的此一過程將如何影響該集體的實質安全行動（政策）；一言以蔽之，即是從安全認同的角度來了解安全政策的演變過程，從這個面向來看，集體在建構安全認同的過程中同時也建構安全利益的內容，國家安全利益可以從累積的認同意志所展現出來。^⑩從整體的國際社會文化環境來說，環境將藉由影響認同的方式形塑出安全認同特徵，而認同特徵又進一步勾勒認同的方向，並因此表現特定的國家利益與政策傾向，這些國家間共有的政策理解、利益分享與合作、認同競爭與融合又反過來形塑出文化環境的構成因子。^⑪

如果要提出認同理論來理解波蘭的安全政策，則我們必須能夠提出證據證明波蘭的安全認同改變先於環境的演變，又或者是認同的改變決定了國家政策的走向，而非環境變遷迫使政府採取若干決策因應，並同時導致認知上的轉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環境的鬆動並無法導引個人與集體認知的方向，當然也就無從決定個人與集體的認同目標。在此架構下，假定認同的轉變先於環境之前，並進而影響波蘭安全政策的變遷，則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安全政策的後續變化。就觀察實際波蘭的安全政策轉變而言，民主化與非共化初期的安全政策突顯此一轉變，在面對一個嶄新且不確定的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環境，以共產主義為代表的外部強制力量逐漸失去對華沙當局的影響力，而面對期望加入以北約組織與歐盟為首的西方軍事政治經濟組織，波蘭政治精英與社會大眾首先發現到的是既有價值（如舊有安全觀念、共產的經濟制度）與西方價值（新的安全觀念、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的衝擊；^⑫本文第二部分將就波蘭如何進行此一學習與認知過程進行分析。然而，波蘭的認知與學習過程卻又並非全盤接收西方模式，認知學習理論雖然可以解釋為何波蘭民族選擇「回歸歐洲」，以及採納西歐的發展模式，不過卻仍有解釋不夠充分之虞。^⑬就實際研究發現，波蘭的入盟談判過程並非照單全收，波蘭除了是一個規範接收者（norm-taker）之外，波蘭還企圖成為規範的創造者（norm-entrepreneur），本文第三部分將討論波蘭如何鞏固其民主化之後的民族

註⑨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hortcut to Greatness: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1 (2003), p. 90.

註⑩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75.

註⑪ *Ibid.*, p. 53.

註⑫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7

註⑬ Jack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1994), pp. 279~312; and Andrew Bennett, *Condemn to Repetition? The Rise, Fall and Reprise of Soviet-Russi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1973-1996*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p. 93.

認同與泛歐認同，並進一步說明波蘭在認同的轉變之餘如何添附（affix）其特有的民族認同構成部分。最後，面臨最新一波美歐分裂處於夾縫中的波蘭，他們對跨大西洋分裂做出選擇的結果將是探討重點，本文將對此種結果進行分析，本文將說明此種「被迫表明立場」的態度緣自波蘭深刻的歷史記憶與認知模式，波蘭政府選擇的立場也同時說明了波蘭對外在安全環境認知模式，同時也可以做為理解其他中東歐國家對安全環境的反應態度。必須說明的是，波蘭政府此次的反應方式的確朝向傳統的權力平衡擺動，當安全認同受到環境制約，導致政策重新擺盪回到傳統的權力平衡模式上時，決策背後的認知因素在決策制定過程中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貳、波蘭民主化與非共化初期安全政策的轉型

一、圓桌會議：共黨與非共人士的認知學習過程

本文所稱民主化與非共化是指波蘭於一九八九年非共份子藉由團結工聯的工會運動抵抗共黨的專制統治，並於同年舉行共黨人士與民主派人士的圓桌會議始。理論上，波蘭的民主化要早於非共化，由於波蘭的民主化腳步在前東歐共黨國家實乃引領風潮，當時的民主人士無法預估莫斯科對波蘭民主改革的容忍度有多高，因此一九八九年的圓桌談判雙方僅就國會議員席次開放普選、團結工聯合法化地位、未來總統任期、停止新聞審查與經濟改革等事項進行談判，雙方絲毫未就波蘭共產黨的存續地位進行討論。^⑭這種協商談判模式對波蘭未來的政黨政治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在波蘭首開協商談判風氣，以及受到示範效應影響的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民主化與非共化初期過程中，民主派人士幾乎在首次的普選過程獲得絕對性的勝利，然而因為對形勢認知的判斷差距，波蘭共產黨得以在初次的國會改選仍然掌握過半數的席次，而其主要原因就是共黨依然握有過半數的保留席次，並且得以從容的轉化為左派民主政黨。^⑮

圓桌談判留給波蘭政府的不僅僅是政黨席次等關於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圓桌談判本身的產生就足以解釋共黨與民主派人士的認知與學習過程。早於一九七〇年代的全球經濟衰退之際，波蘭出口總值逐年下降導致外債逐漸膨脹。礙於指令性的計畫經濟模式，波蘭政府雖然採取了若干經改措施，但波蘭經濟市場活動依然無法活絡，政府僅能依靠調高物價的方式來解決日益惡化的財政赤字，不過驟然調高物價的結果使

註⑭ 普選席次的分配方式如下：60%的席次保留給波蘭共產黨與左翼政黨，5%席次保留給親共產主義的天主教會團體，餘下的35%才開放競選。Witold Mizerski, *Tablice Historyczne* (Warsaw: Wydawnictwo Adamantan, 2002), pp. 295~297.

註⑮ 1990年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蘭共產黨，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ZPR）解散，由左派「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 of the Polish Republic, SdPR）繼任，選舉Aleksander Kwasniewski為首任領導人。

得一般大眾無法負擔基本民生必需品的消費，因而導致波蘭境內一連串的示威與罷工抗議，從而使一九八一年當時的共黨總書記雅魯賽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宣佈戒嚴，宣佈團結工聯的前身「防衛工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Worker, KOR，後轉變為 Self-Governing Trade Union Solidarity, NPZZ）為非法組織，並立即採行大規模鎮壓行動。^⑥也因此，當一九八九年共黨政府與以團結工聯為首的民主派人士考慮圓桌談判的舉行，雙方皆以過去的抗爭記憶重新塑造與當前對手的談判基礎：在團結工聯方面，由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團結工聯對停止物價改革與完全開放自由選舉的要求採取堅硬立場，與共黨政府毫無妥協空間，導致最終共黨政府無法接受團結工聯所求，不得已宣佈戒嚴的此一後果，一九八九年團結工聯決定調整此一戰略，放棄「全有或全無」（all or nothing）的做法，改而尋求共黨內部開明派與社會其他階層的支持（如教會與知識份子）；在共黨方面，雅魯賽斯基認知到八〇年代的戒嚴效果有限（如團結工聯依然存在，經濟危機依舊無法擺脫）、黨內開明派人士也咸認強力鎮壓無法達成目標，因此願意改弦更張，以平等協商的方式解決國內政治與經濟危機。^⑦

雙方折衝樽俎過程以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Lech Wałęsa）與共黨總書記雅魯賽斯基週邊的謀士所形成的持續的、不斷密集的對話團體所隱然形成的認知與學習過程成為雙方互動的主要媒介基礎。由於先前因波蘭國內實施戒嚴措施導致雙方沒有可供直接溝通的管道，因此初期的接觸由當時軍管政府推派 Czesław Kiszczak 將軍與波蘭主教 Bronisław Dąbrowski 間接接觸，就雙方意向進行初步了解。一九八八年波蘭經濟危機再起，親團結工聯的大學教授 Bronisław Geremek 代表工聯，提出「反危機公約」（anti-crisis pact）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俟後一邊由當時軍管政府接任內政部長 Kiszczak 將軍與共黨開明派領袖 Stanisław Ciosek 領銜，另一邊由華勒沙、Tadeusz Mazowiecki（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理）等與宗教代表 Dąbrowski 為見證的密集談判為正式的圓桌談判奠定基礎，雙方主要參與協商的政治精英與反對派領袖各約三十名。^⑧這些參與圓桌談判的政治精英與反對領袖不僅從談判過程中得知對方的談判底限（如對司法制度中立、傳播媒體的控制、地方政府職權、健康醫療保險等議題），同時也藉由談判過程消除雙方敵意。^⑨共黨與反對派人士內部也有主戰與主和

註⑥ Roger East and Jolyon Pontin, *Revolution and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Wellington House, revised edition, 1997).

註⑦ Jon Elster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1~68.

註⑧ 參加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至四月五日圓桌談判的黨政代表為二十九人，反對派人士為二十六人，另有教會代表三人。

註⑨ 反對派人士在談判的過程中企圖拉長戰線，將原先鎖定的談判目標予以廣化，擴及到地方制度、教育體系、民間中介團體、住房補貼、農礦業與環境保護等。反對派人士的主要用意並不在於企圖以一次的談判解決所有問題，反倒希望可以藉公開協商的過程將幾方的改革意見傳達給一般大眾。

的不同意見，共黨政府甚至因內部對社會與經濟改革政策持有不同意見而派出雙重代表，凡此皆讓與會的相關談判人員認知到政治談判的複雜性，並進而使最低限度的談判結果得以定案。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無論是共黨政府或反對派人士都不具最後拍版定案的權力。論者以為，參與談判過程的相關人士體會到彼此不具絕對性的優勢，因此「遊說」與「被遊說」的空間存在於雙方互動；共黨人士一方面以遊說者的身分出現，但同時也是反對派人士遊說的對象，在遊說的過程中因為缺乏具強制力的拘束方式因此雙方最終順從的立場也有別於強制方式的協商談判，此種相互順從的模式有賴於以下幾項文化環境因素的配合：第一，雙方同樣處於一個新的或不確定的環境。危機或衝突是導致此一新環境出現的主因，經濟改革政策的失敗與戒嚴時期的軍管作為同樣為此不確定環境平添新的誘因，而莫斯科當局渾沌不明的曖昧態度也是加深此一文化環境特徵的主要外因。^②第二，遊說者不用演講的方式向被遊說者提出需求。由於雙方採取協商方式對有爭議的議題進行談判，雙方人數固定，議題也於先前的會前會訂定，因此鮮少出現擦槍走火的情形，同時談判過程也就較少訴諸激情的言詞，故能較為平心靜氣的討論具爭議性的話題，如團結工聯的合法地位等。^③第三，事前的秘密協商與最終的結果公開有助於雙方事前免於受公開壓力、事後又有公眾輿論加以監督。從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六日內政部長 Kiszczak 與華勒沙在華沙市郊 Magdalenka 市舉行秘密談判起，到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正式談判止，雙方利用不公開的管道進行議題的協商，除進行次工作小組的分配以外，雙方還利用這段時間處理各自內部不同意見，共黨方面就藉共黨的第十屆全體大會召開以確定黨的路線，並消弭共黨內部不願和談的聲音。^④第四，對所有雙方妥協後的最終協議要有公證人在場做證。從波蘭圓桌談判的例子中可以發現，作為共黨政府與反對派人士的公正代表，從頭到尾都是由宗教人士擔任，宗教的出世象徵已經具有道德上的優位，同時波蘭的宗教團體又具有政治與經濟、社會的入世力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成為教廷國教宗前即是波蘭裔的波蘭主教，教宗本人又極端重視波蘭的民主化，一九八七年教宗第三度訪問波蘭，表達對人權的重視，要求勞動階級有組織工會自由，並同時不顧政府反對接見華勒沙，教宗的訪問還因此造成波蘭民眾數十萬人上街參加教宗舉行的彌撒，天主教對波蘭的影響可見一斑，也因此天主教在當時順理成章成為雙方談判的見證。

註② Philip Zimbardo and Michael Leippe,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 Change and Social Influe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1), p. 225.

註③ Charlotte Jorgensen, Christian Kock, and Lone Rorbech, "Rhetoric that Shifts Vot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ersuasion in Issue-Oriented Public Debat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5 (1998), pp. 283~299.

註④ Jon Elster, "Arguing and Bargaining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and the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Raino Malnes and Arild Underdal ed., *Ra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s*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91), pp. 46~47.

二、安全政策演進：國家安全利益的重新擬定

波蘭舉行圓桌談判後不久，隨即召開國會選舉，選舉結果以團結工聯為主的反對派人士大獲全勝，但卻又因為共黨仍掌握過半數的保留席次，因此雙方籌組聯合政府。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波蘭公佈了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份國防綱領白皮書（Defense Doctrin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這份白皮書有其歷史意義：既是九〇年代初期為因應安全環境的特殊產物，同時又是波蘭國家利益轉變過程的戰略指導方針，波蘭政府在這一份國防綱領文件中表達出來的訊息是，作為東西集團對抗的中間地帶，波蘭將試圖避免東西大戰發生，以免戰火波及到本國領土；同時，波蘭也不再把安全問題完全置於華沙公約組織的宰制之下。^②然而，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波蘭又另行推出了一份新的「波蘭安全政策基本原則」（The Principles of Poland's Security Policy）以及「波蘭共和國安全政策與國防戰略」（The Security Policy and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兩份關於波蘭的安全政策指導性綱領。^③一九九二年的新文件表明了對來自東方安全威脅的顧慮，以及公開表明希望加入北約，藉由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來提昇波蘭一旦遭遇東方軍事攻擊時的抵抗能力。從這短短三年的時間演進（一九九〇～一九九二），波蘭的安全政策改變不可謂不大；然而，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波蘭政府採取了如此規模龐大（安全綱領的改變不僅僅是戰略目標的修正，同時還需要顧及武器系統更新、人員編制調整、後勤補給等問題）、影響深遠（波蘭政府勢將重新調整其外交與安全政策，如果尋求加入北約，波蘭將不可能東西兩面討好，甚至有可能因此激怒俄國）的新安全政策？如果這僅是波蘭反共人士一廂情願的做法，日後新上台的後共政黨（波蘭共產黨蛻變為民主左派聯盟後於一九九三年重新奪回國會多數地位，並於一九九五年奪回總統寶座）將可能推翻反共派的安全政策，但事實卻證明新上台的後共政黨不僅未推翻反共派的安全政策，波蘭正式成為北約組織的會員國還是在後共政黨執政時期實現。

大部分的波蘭政治精英都認知到波蘭的外交目標存在潛在衝突，這種衝突來自於既有國防與安全體系對前蘇聯的依賴與追求獨立自主的安全政策。由於政治精英對國際安全環境認知產生變化導致外交政策的革新殷鑒不遠，蘇聯時期戈巴契夫推行的「新思維」外交政策對蘇聯八〇年代中期以後的影響甚鉅，論者以為戈巴契夫認知到蘇聯與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競爭過程已使蘇聯屈居下風，因此戈巴契夫的首要工作就是振衰起蔽，不過顯然戈氏不是走軍國主義的回頭路，戈巴契夫嘗試走一條與舊蘇聯不同的

註② Stanislaw Koziej, "Polish Defense Policy's Evolution," in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2001), p. 405.

註③ 二〇〇〇年波蘭政府再度提出國家安全戰略與國防政策白皮書，內容更朝向重視合作安全機制方向發展，包括更為重視北大西洋的合作夥伴關係，包含對「北大西洋理事會（NACC）」、歐大夥伴理事會（EAPC）」、「北約和平夥伴計劃（PfP）」，以及更為重視烏克蘭的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Ibid.*, p. 411; 或楊三億，「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2期（民國91年3/4月），頁94～95。

道路，這是一條企圖藉推行具有「道德與遠見」的外交政策使蘇聯重新獲得國際的領導地位。^⑤同樣的，波蘭的政治精英發現外交目標衝突之際，這些精英與外交謀士並沒有一條可供遵循的既有規範可尋，他們必須從不斷變化中的環境擷取訊息，並根據本身過去累積的經驗與內在價值模式做出選擇，這些經驗的累積與自我的價值模式內化成記憶，而集體的「記憶」又會相當程度的影響決策過程。集體記憶的能力不僅在波蘭國內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讓朝野雙方能夠根據過去記憶避免重蹈八〇年代的覆轍，記憶也可以對國家安全認同產生重大影響，其中一個關鍵作用在於記憶如何被安全政策的決策精英理解。^⑥波蘭人的集體記憶因民主化過程衝擊了波蘭人對安全概念的理解、對尋求安全的解決途徑、以及重新調整對威脅來源的認知：

(一) 對安全概念的重新理解

古典的安全觀念認為安全必須由個別國家承擔，其他國家要不存心不良，要不野心勃勃，沒有一個國家應該把自身安全置於他國的善意底下；這是一種霍布斯式的恐懼，國家間的互不信任感會造成對其他國家有現實的恐懼感，別國也有相同的恐懼，也許對別國根本無傷害之意，但無法使別國了解你的意圖，也無法了解別國為何會如此的神經質。^⑦德國宰相俾斯麥（Bismarck）就曾舉出這樣的例子，說明在車廂裡的陌生人不斷注視著其他人，當一個人把手放進口袋時，他旁邊的人也準備好自己

註⑤ 關於此種說法有幾項說明可供佐證：第一，戈巴契夫放棄布里茲涅夫的限制主權論與軍事對抗政策，並放棄對國際共產運動的支持；第二，戈巴契夫對前東歐共黨國家的民主化運動不僅未加干預，而且還大力讚揚，戈巴契夫甚至認為東德領袖何內克太過冥頑不靈，跟不上戈氏本人的腳步；第三，戈巴契夫推行新思維外交政策時並沒有要求大規模物質上的回報，因為這有害戈氏道德與具遠見的領導地位。請見 Emanuel Adler, "Cognitive Evolution: A Dynamic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ir Progress," Emanuel Adler and Beverly Crawford eds., *Progres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Vladislav Zubok, "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Factor' i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198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 12, No. 13, pp. 5~23; Thomas Risse, "The Cold War's Endgame and German Unification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159~185;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hortcut to Greatness: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op. cit.*, pp. 77~109.

註⑥ 記憶的影響又可以區分為四種不同面向：1. 作為中立的認知/描述工具 (neutral cognitive-descriptive instrument); 2. 作為對歷史事件的深層的認知/反射工具 (cognitive-reflective instrument of deeper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3. 對過去與現在事件情感的評估 (emotional reassessment of both past and present); 與 4. 作為合法性的工具使用 (instrumental-legitimizing tool)。這四種影響方式並不一定同時出現，影響的層級與範圍也非固定，然而，記憶確時常在重要時刻發揮關鍵力量，以影響政治精英與一般大眾的面貌出現。論者常用過去歷史事件來詮釋中東歐國家政治與民主變革過程中的重要力量，如本文對波蘭重新解放後的國家安全利益詮釋方式。Marek Ziolkowski, "Three Levels of Social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Twentieth Century and Four Functions of Memory Thereof," Radoslaw Markowski and Edmund Wnuk-Lipinski eds., *Transformative Path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rsaw: Instytut Studiow Politycznych Polskiej Akademii Nauk, 2001), pp. 124~130.

註⑦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London: Collins, 1951), p. 21.

的左輪手槍，以便能夠先開火，因此這種局面也可被稱為神經質模式（nervousness model）。^②

不過，這種安全關係的互動效應時常造成一方感到不安全，另一方也會沒有安全可言，對長期身陷歐洲東西對抗、無法自主決定國家安全政策或和或戰的波蘭而言，毋寧說是一種被壓迫的安全政策。時至民主化與非共化的波蘭政治變遷，民主化改革與重視人權保障已經成為全國共識，反對派領袖藉由對共黨政府的獨裁統治、經改措施不彰、秘密警察統治、媒體獨占等控制手段大肆抨擊而掌握政權，繼起的後共政黨大抵上也僅能遵循民主化的腳步；反射到對外的安全政策理解層次，由於鬆動了長期以往僵化的社會性思考束縛，如善與惡、自我與他人安全的對立，波蘭產生了一種民主化的社會化過程，「合作安全」成為波蘭外交政策的一大主軸。合作安全的主要內涵是降低軍事層次的安全面向，取而代之的則是重視政治合作與人權保障的國際交流，希望藉由信心建立措施與和平解決爭端的方式來降低衝突的威脅，^③而強調合作安全的基本要素就是遵循可信賴的「負責任的規範」（accountability norm），表現在內政層次上則是政府對其人民的態度依循民主法治之治，可以取信於其他西方國家，表現在對外層次上則同樣外顯為對條約、人權、合作的尊重與實踐；對大部分的中東歐國家而言，遵循負責任的基本規範不僅僅是一項口號，還必須是一項具體行動，如此才有可能被西方社會所接受，^④因此，波蘭積極加入國際組織，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⑤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等，波蘭突出對人權保障的用心最終獲得肯定，波蘭於二〇〇二年執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國一職。^⑥

（二）對威脅來源重新定義。

除了合作安全基本精神外，國家安全維護的對象也由過去的國防軍事安全擴展為「綜合安全」，綜合安全概念包含了軍事層次的領土與邊界安全、資訊安全；非軍事層次的經濟安全、能源安全與社會安全等，一個對綜合安全比較全稱的說法是「對安全的威脅可以是一項行動或一連串的事件，這些行動或事件將會深刻的影響一個國家與其居民的生命，或這些事件將會大大限縮國家政府施政的決策範圍。」^⑦民主化以

註② T. C. S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07~208.

註③ Janie Leatherman,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the CSCE: Learning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28 (1993), p. 414.

註④ Radoslaw Markowski,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News from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ies," Radoslaw Markowski and Edmund Wnuk-Lipinski eds., *Transformative Path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rsaw: Instytut Studiow Politycznych Polskiej Akademii Nauk, 2001), pp. 47~72.

註⑤ 洪茂雄，「歐洲理事會擴大組織的背景與意義」，*美歐月刊*，第11卷第8期（民國85年8月），頁106。

註⑥ *Polish News Bulletin* (Warsaw), 2002/03/25, p. 2.

註⑦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Summer 1983), p. 133.

後的波蘭政府援引上述說法，對威脅來源的認知產生改變，波蘭不再單純視某一面為威脅來源（國外勢力的武裝侵略），而是重新審視波蘭整體安全評估。^④同時波蘭政府對歐洲發生大規模戰爭的預期心理降低，但提高對不對稱威脅的重視程度，因此要求在軍事事務上軍隊要能夠執行多樣化任務（應具備抵抗小型衝突能力，同時具備局部快速動員能量），要能夠處理因大規模的難民潮、偷渡、走私所引起的邊境壓力，甚且，波蘭也必須和西方盟國具軍事上彼此操作的能力（inter-operational capacity），亦即指揮、管制、通訊、情報、資訊的體系相容，俾能於危機或衝突發生時相互支援。

經濟面向的安全政策成為後冷戰時期以來波蘭非常重要的安全環節，此乃因政治軍事架構還有賴適度的經濟配置來完成，因此，使用國家經濟體系的諸般工具如關稅與匯率、經濟政策、防止潛在威脅（避免外界不正常干擾）等對波蘭而言全屬嶄新挑戰，這些工具的使用是為應付外來經濟威脅，如匯率不穩、經常帳收支逆差、他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等，波蘭採取的解決之道是大幅度且迅速的開放經濟與金融交易體系，藉由資本流通自由化（吸引外資對波蘭經濟大有助益）來和國際財政制度聯繫，雖然此舉可能會造成外債上揚，但控制得宜則外債不足為懼，並輔以外匯儲備作為國際償付的準備金，同時透過發行公債與公營企業私有化方式募集資金。^⑤

相較之下能源問題比較困擾波蘭當局，截至目前為止波蘭歷任政府還沒有一套有效分散波蘭油源進口的方案，由於蘇聯時期波蘭的石油進口操縱在莫斯科手中，波蘭目前絕大部分的石油進口接來自於俄羅斯，因此目前波蘭計畫的石油分散計畫有幾個方向：其中之一是開發新的進口國，例如波蘭將向烏克蘭進口石油五十萬噸，^⑥其二則為開發新油管，透過伊拉克積欠波蘭外債的五億六千萬美金，波蘭希望伊拉克可以以透過石油的支付來償還，並希望建造一條從黑海經波蘭抵達西歐的油管。^⑦另外，波蘭加入歐盟後也有分散油源的對應計畫，不過每單位的油價從西歐進口則遠高於從俄國進口，因此成本上的考量也將限制波蘭的油源分散計畫。

（三）尋求安全的解決途徑

波蘭尋求安全的解決方式可區分為短期作為與長期作為：從短期來看，加入北約組織是其主要安全目標。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的外交部長在波蘭第二大城克拉克夫（Cracow）集會，首次公開集體表達他們加入北約組織的意願，其後就開始一連串不斷的向西方國家釋出加入北約的意圖，而當時的北約會員國都還沒有真正考慮到北約是否應該東擴，或者北約東擴之後將會有或正或反的

註④ Boleslaw Balcerowicz, "Armed Forces in Polish Defense Policy," in Roma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op. cit.*, pp. 439~465.

註⑤ Edward Halizak, "Economic Aspects of Polish Security Policy," *ibid.*, pp. 466~489.

註⑥ 波蘭南方煉油廠 (Southern Oil Refineries) 開始與烏克蘭商談關於五十萬噸原油進口，這條油管 (Odessa-Brody) 是從裏海盆地出口到斯洛伐克，匈牙利與西歐。 *Polish News Bulletin*, 2003/07/15, p. 5.

註⑦ *Gazeta Wyborcza* (Warsaw), 31 March 2003, p. 24.



效應出現。美國真正認真考慮北約東擴的態度，一直到一九九四年美國國會通過「參與北約議案」(NATO Participation Act)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在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會上的發言支持才略見曙光，^③最終美國態度底定決心接受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也要等到一九九六年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為求競選連任、美國的中東歐裔族群全力遊說參眾兩院、國務院支持此一東擴方案，而後首批中東歐國家才得以進入實質的入約談判。^④從這個角度來看，波蘭與其他中東歐國家是以鼓吹者的身分遊說北約許諾這些國家加入，遊說的過程不斷強調北約組織有助於該區的政治民主穩定與經濟自由發展，長期來看對歐洲安全的發展具有正面的效果，更有甚者，波蘭還希望將這一套鞏固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發展模式推廣到其他的東歐國家，如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從波蘭的內部經改措施來看，波蘭的經濟改革採取「震盪療法」以作為解決共產主義體系下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一帖藥方，並作為尋求鞏固經濟安全的政策做法。^⑤無論是政治軍事層次或內政經濟改革，波蘭政府咸體認到未來波蘭的國家安全將不僅僅是單純的一國安全，波蘭安全也將不可避免的會與周邊國家構成緊密的聯繫網。

另外，從長期觀點來看，即將身為北約會員國的一員加強了波蘭的外部信心，使波蘭與其東西鄰國家可以從多面向的安全合作進行交往。例如，自從九〇年代初期開始，波蘭與法國和德國的國防部長與重要軍事將領，以及其他軍事科技人才展開頻繁的雙邊與多邊接觸，這些國家不僅進行關於陸地與海上的軍事演習，法國並曾經代為訓練波蘭的潛艦官兵與戰機飛行員。波蘭也在歐安會議的支持下，積極參與信心建立措施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CSBMs)與歐洲傳統武力條約(The Treaty on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CFE)，前者有助敵對各

註^③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US GAO) (1997a), "NATO Enlargement: US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Assist Potential New Member," Report to the Chairma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AO/NSIAD-97-164, June, US GAO, Washington, D. C. 在1995~1997年之間，美國就曾經撥款三億美元協助23個PIP (Peace for Partnership program)會員國，其中將近一半的資金流入了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六國，這些資金絕大部分是使用於空中交通儀器的添設。

註^④ Les Kuczynski, *Expansion of NATO: Role of the Polish American Congress* (Chicago: Alliance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1999); George Grayson, *Strange Bedfellows: NATO Marches Eas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註^⑤ 震盪療法的基本要素是具備開放的政治體系，並配合政治體系的民主改革大力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擺脫計畫經濟制肘，而其中的關鍵改革就是放鬆政府管制、公營企業私有化、降低政府補貼措施與增進對財產權的保障。波蘭經濟改革總工程師Leszek Balcerowicz就是震盪療法信奉者，認為波蘭需依靠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才能有效消除共產主義的經濟體質，至於對改革過程中所引發的陣痛，Balcerowicz認為依靠適度的政策手段將可以把陣痛傷害降至最低，請見Leszek Balcerowicz, *Socialism, Capitalism, Transformatio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Leszek Balcerowicz, Barbara Blaszczyk and Marek Dabrowski, "The Polish Way to the Market Economy: 1989-1995," in W. Woo, S. Parker and J. Sachs eds.,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Comparing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p. 131~160.

方的軍事緩和 (military relaxation) 態勢，在巴爾幹的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 (Bosnia-Herzegovina) 地區就曾經根據這項措施指導實行「緊急狀況的穩定措施」 (stabilization measures in crisis situations)，該措施要求交戰各方交武器儲存並由國際監管的措施。此措施同時也被波蘭援用，希望在中東歐與波海地區仿效施行，藉以消除俄國與中東歐地區國家的潛在武裝衝突；CFE雖然在國際舞台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但仍有消除在中東歐地區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輔助性效果。從長期觀點來看，波蘭的安全政策將持續在軍事合作、軍事透明化、對國際條約的保證執行與信心建立措施各方面進行拓展，從「相互合作」的觀點來進行軍備管制與區域和平的穩定，並以此作為未來建構波蘭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基礎。

叁、到歐盟之路：深化的安全認同

目標的修正而非僅僅手段的改變是波蘭民主化之後安全政策一個重要的標誌，華沙的安全政策絕非單純的從過去向蘇聯靠攏轉變為向西方靠攏的單純思考，在波蘭順利地成為北約組織的會員國後，加入歐盟成為目前波蘭最重要的對外政策，這一對外政策本身並同時衝擊波蘭的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歐盟東擴雖同時涉及了對利益取向與認同取向的雙重影響，但東擴效應對新舊會員國的影響程度卻不盡相同：對舊有的會員國與歐盟而言，東擴雖然牽涉了歐盟的廣度改革，但對既有 15 個會員國的政治經濟衝擊與歐盟一體化的關心 (深度改革) 遠高於對新成員國的未來發展；而對即將成為歐盟正式會員的 10 個中東歐與地中海島國，主要的關心則著落在能不能藉由加入歐盟的過程中鞏固得來不易的政治民主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能否為第二波的經濟發展添加新的動力。

一、經濟面向分析

對波蘭而言，加入歐盟首要的挑戰首先是需要符合歐盟設定的標準，雖然早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維斯格拉瓦德 (Visegrad Group) 成員國波蘭、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歐洲共同體簽署了「歐洲協定」 (Europe Agreement)，但雙方之間仍存在貨物、人員、資本與服務的自由流通部分障礙，也因此，為了達成雙方貿易的完全自由流通，波蘭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式與歐盟進行入盟談判，而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歐盟哥本哈根高峰會正式結束談判。^④從談判結果來看，歐盟與波蘭雙方最終協議的相互經濟利益得失是溫和的。首先在農業補助款的部分，根據雙方協議，為避免初期對歐盟財政預算造成龐大排擠壓力，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歐盟對波蘭的農業補貼比率分別為 25%、30%、35%，補貼的對象是種植馬鈴薯、牛、豬肉及其他養殖業 (種植面積超過一公頃的農夫按種植面積補貼)。為縮小波蘭農民與西歐農民間的差距，雙方還同意援引其他項目來增加農業補貼額度，其中之一是約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2/12/17, p. 1, 10.

占農業補貼 15% 的歐盟基金基礎建設補貼，而另外的 15% 補貼來自波蘭的財政預算，這總共就構成了相當於歐盟國家 55%、60%、65% 的農業補貼。其次，波蘭雖然在農業補助款的部分無法立即獲得與法國、西班牙等西歐相等的補助比率，但波蘭取得在二〇〇五~二〇〇六年期間一項 10 億歐元的特別預算補助，允許提高牛奶銷售配額 150 萬公噸，以及 1 億 800 萬歐元的邊境治安維持費；^②而在財政支出方面，二〇〇四~二〇〇六年波蘭將需支付歐盟財政預算約 65 億歐元，而在相同的時間之內波蘭將可以從歐盟財政當中獲得約 190 億歐元的補助，但波蘭也可能同時損失約 8 億歐元左右的關稅收入；此外，波蘭未來還需負擔部分基礎建設支出以配合歐盟標準。就整體的短期財政與稅收效益而言，波蘭加入歐盟的效應是正面溫和的。^③

從中長期的觀點來看，歐盟東擴的效應對新舊會員國也皆屬正向。東擴對波蘭而言，無論官方或民間獨立機構的研究顯示波蘭加入歐盟的中長期效應利大於弊，波蘭的國民生產總值成長幅度在二〇〇五~二〇〇七年間每年將有 5%，而資本積累成長每年將高達 12~14%。這數字代表了投資爆炸，也帶來了強盛的進口需求，並且也會間接導致經常帳的赤字升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5%；同時根據樂觀預期，二〇一一年以後因波蘭產品競爭力相對增加，出口成長可以每年 9% 的速度相對提昇，國民生產總值更可以超越 5%，通貨膨脹率則可以控制在每年 3~4% 之間。^④相對的，東擴對歐盟來說也有積極作用，光是歐盟內部市場就可增加將近一億的消費人口，對舊歐盟成員國而言增加的市場消費約有 100 億歐元；^⑤此外，由於地處鄰近中東歐地區，歐盟東擴的經濟衝擊對歐盟東邊會員國，如德國、奧地利的影響又較西邊為大。

二、安全與政治面向分析

經濟效益是波蘭加入歐盟的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但除了經濟因素外，波蘭著眼於加入歐盟的安全與政治效應更是波蘭安全政策的重要考量。

加強政府職能是波蘭著眼加入歐盟的第一項政治效應。由於憲法規定，波蘭的行政權分屬總統與內閣總理分享，當總統與總理分屬不同黨派時，國內政治極易引起風潮；同時，內閣總理尚需面對來自國會反對黨的挑戰，國會可以透過不信任投票的方式迫使國會提前進行大選，或要求總理或不適任的部長下臺。波蘭總統與總理不同黨派的情形分別出現在前任總統華勒沙與現任總統克瓦茲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任期內，從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以及一九九七年

註② *Gazeta Wyborcza*, 2002/12/12, p. 4.

註③ 從短期財政與關稅收入而言，波蘭加入歐盟的經濟收入大於支出，不過，更為詳細的數字統計則有賴各項相關建設計劃的通過與執行，目前所得的數字僅為概略評估，與未來最終確切的執行金額或有出入。

註④ *Polish News Bulletin Economic Review* (Warsaw), 25 April 2003, pp. 1~8; *Rzeczpospolita* (Warsaw), 22 April 2003, p. B1; *Gazeta Wyborcza*, 22 April 2003, pp. 14~15.

註⑤ Andrew Moravcsik and Milada A. Vachudova, "National Interests, State Power, and EU Enlargement," *Perspectives* (Prague), vol. 19 (Winter 2002/2003), pp. 21~31.

十月二十日到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九日。不同黨派之間對於波蘭應該要以何種方式加入歐盟各自存有歧見，左右政黨對加入歐盟過程中應否讓步、妥協，以及退讓多少，經常成為朝野之間的重大爭議，例如就農業補助款的問題處理上，執政黨不斷遭受左派農民黨（The Peasant Party）的挑戰與極右派自我防衛黨（The Self-Defense Party）的攻訐，要求政府在加入歐盟初期就應享有與西歐國家相同的補助款分配比率。另一項削弱波蘭政府職能的原因是波蘭財政的沉重支出，波蘭財政赤字接近政府二〇〇三年總預算的 55%，礙於龐大失業人口所帶來的失業救濟與社會福利支出，以及負債沉重的國營事業（如採礦與造船業），政府幾乎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建設投資，加入歐盟後波蘭則必須符合歐盟各項標準，如基礎設施歐洲化、規格標準化、衛生同步化等，政府站在一個更為有利的位置進行波蘭內政改革，倘若缺乏波蘭的外部壓力，波蘭將很難在短期內獨立進行如此工程龐大的內政改革。從決定加入歐盟後不久，透過政府職能的加強，波蘭政府可以就若干敏感性的安全議題進行重大調整，首先是加強波蘭邊境的維護與簽證的發放，透過對外籍人士簽證的核准（主要是俄國、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等國），波蘭可以有效的掌控東部邊境的治安與減少地下經濟活動。^⑥其次，在歐盟法律規範下進行對國家公有經濟體制的調整，減少國家對公營企業財政補貼，改進之道是透過賦稅或社會保險減免的方式進行；^⑦再其次，在歐盟相關機構的配合下制定國家未來發展計劃，諸如城市發展與道路發展計劃。^⑧

到歐盟之路的第二項考量則著眼於波蘭加入歐盟後，將可以透過制度內的合法地位擴散波蘭的安全認同觀，進一步鞏固波蘭在歐洲安全體系內的位置。就實際研究發現，波蘭的入盟談判過程並非照單全收，波蘭除了是一個規範接收者之外，波蘭還企圖成為規範的創造者。我們不難發現為何華沙在加入歐盟過程中扮演中東歐國家意見領導者的角色，此乃不僅由於波蘭土地面積大，人口眾多，更在於波蘭的特殊社會結構與安全顧慮足以說明這批即將加入歐盟的新興民主國家所隱含的特殊需求，這一種在歐盟制度內發聲的表現，可以從幾個方向了解：

首先，由於龐大的農業人口構成波蘭經濟體質特色，相較於歐盟各國，波蘭農產品對 GDP 的貢獻達到 3%，而歐盟的平均值則為 2%；同時，波蘭平均每個家庭花費 30% 的所得於購買食物之上，這個數字同時也是歐盟的兩倍。更為驚人的是，波蘭的第一級產業（Farming Industry）僱用了 19% 的總體勞動力，相對於歐盟而言僅有 5% 不到。^⑨農業人口眾多與技術發展程度相對低落的因素構成了華沙與歐盟談判過程中相當重要的環節，華沙希望藉由提高農業補助款的方式，讓波蘭可以以歐洲重

註⑥ *Rezcpospolita* (Warsaw), 02 October 2003, p. B1.

註⑦ *Rezcpospolita*, 23 September 2003, p. B1.

註⑧ 波蘭獲得歐盟「歐洲城市交通與環境聯盟永續發展計劃」(European program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aLLiance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 TELLUS) 的補助款約 5 億歐元，對波蘭海港 Gdynia 及其他城市進行環境與交通的更新發展，請參閱 *Warsaw Voice*, 05 October 2003, p. 9; *Rezcpospolita*, 25 September 2003, p. B3.

註⑨ *Polish News Bulletin*, 14, February, 2003, p. 8

要穀倉的方式繼續存在。^⑤

其次，波蘭將近九成以上民衆信仰天主教的此一因素也強化了波蘭對未來歐洲發展的主張。前述所及，天主教教會對波蘭甚且中東歐國家的民主改革產生一定的影響，不僅教會在若干社會議題上（如同性戀婚姻、墮胎合法化等）擁有關鍵性的影響力，教廷國教宗與波蘭教會體系也對波蘭的歐盟之路產生正面助益。基於對宗教力量的尊重與配合，波蘭企圖對未來歐洲的發展揉入更多上帝的色彩，諸如希望在歐盟憲法草案當中加入關於基督教精神的字眼，以及保留對墮胎問題的最終主導權。^⑥ 如果可以在歐盟憲法中納入宗教精神，對波蘭人的民族意識與未來歐洲發展，將可以朝更有利於波蘭的方向前進。

第三，更重要的安全面向則是華沙緊緊扣住北約組織與歐盟的未來關係。此點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加入歐盟有助於波蘭在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影響。華沙已經不只一次的宣稱加入歐盟的起點絕對不會是波蘭與東邊關係的終點；相對的，華沙希望藉由本身加入歐盟的過程提供東邊國家學習的基礎，也要求歐盟在適當的時機考慮納入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並在波蘭加入歐盟的架構下處理波蘭與俄國間的政經關係。^⑦其次，華沙不僅努力推動歐盟的東邊觀點，同時也積極敦促北約正面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交往，華沙的想法是，由於加入北約的先決要件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文人領軍、提昇科技與組織能力，以及與北約其他成員國擁有相互操作的能力，因此一旦讓波蘭東邊國家加入北約後，波蘭與這些領土相連的國家發生非預期性的衝突將大為降低，而透過螺旋式的效應，成為北約會員國又可以增強這些國家民主化的鞏固基石。^⑧

總之，波蘭的安全認同已經逐漸轉移到以合作安全為主軸的架構，以及在此過程中逐漸深化的安全認同觀點向外擴散，企圖引導東邊鄰國朝向「波蘭式」的發展道路，這一點，在所有前東歐共黨國家的安全轉型過程中是具有相當意義的，因為此種安全認同的轉變不僅連帶影響安全政策的調整，同時也讓波蘭與其他中東歐等國不僅是歐洲安全環境的消費者，而是以建構安全環境的參與者身分加入。

肆、面臨美歐分裂：被迫表明立場

二〇〇三年三月美國與英國在沒有聯合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對伊拉克出兵，此一事件對國際政治產生重大影響，連帶也衝擊到波蘭的安全與外交政策。雖然土耳其因為美軍進攻伊拉克的問題而訴諸北約憲章第四條，不過面臨美國與德法間的分裂，土耳其並未能因首次援用北約相互協助的義務規定而獲得北約軍隊的協助。反對美國最

註⑤ *Gazeta Wyborcza*, 18 November, 2002, p. 1; *Rzeczpospolita*, p. A2.

註⑥ *Rzeczpospolita*, 21-22 June, 2003, p. A1, A2.

註⑦ *The Warsaw Voice*, no. 7 (747), 16 February 2003, p. 9.

註⑧ Roman Kuzniar, "Security Policy in Polish Foreign Policy," in Kuzniar ed.,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op. cit.* p. 68.



力的法國表明，法國反對美國在土耳其境內部署愛國者飛彈及其他軍事裝備，法國的反對聲音也獲得德國與比利時的支持。比利時外交部長米契爾（Louis Michel）反對美國部署相關武器的理由是，「一旦美國進行愛國者飛彈的部署，這就顯示我們（指同是北約成員國的西歐國家）已經進入了戰爭的邏輯」。^④美國則指責這些國家違反了北約同盟國有相互協助的義務，而且對愛國者飛彈與其他防止化學武器裝備的部署之禁運是一種「既可恥且不容寬恕」的行為。以法國與德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反對美國出兵而導致的「跨大西洋分裂」，對波蘭誠屬意義重大，如今波蘭已經加入北約組織，並且是歐盟的準會員國之一，華沙要怎麼面對盟友間的分裂，的確令當局傷透腦筋。

波蘭在這一次的美歐分裂過程中被迫表明立場，波蘭選擇站在美國一方，與同是北約成員的英國、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丹麥，以及新加入的捷克與匈牙利八國，發表聲明支持美國處理伊拉克的立場（通稱為“letter of eight”），而緊接在這八國發表聲明後，即將加入北約組織與其他中東歐地區的十個國家也立即跟上，表明對民主制度與人權保障的尊重以及支持美國的立場。^⑤

習慣上理解華沙加入英美聯盟的途徑是權力平衡，根據這項理論，身處歐洲邊陲地帶國家，如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為求彌補可能出現失衡的歐洲安全狀態，這些國家需要加入一個由霸權領導的國際安全體系，藉以保障自身的穩定與安全。法國與德國聯手反對美國的立場只能增加對歐洲安全環境的破壞，並使北約組織提早進入消亡階段，或是使其邊緣化，不再成為主導歐洲安全體系的重要支柱。^⑥在此前提下，中東歐國家亦步亦趨的緊跟美國旗幟，目的就是要避免美國退出歐洲，維繫北約在全球安全體系的地位。權力平衡顯然可以說明中東歐國家的基本顧慮，不過，我們也會提出進一步懷疑，權力平衡是一個一般性理論據以解釋國家外部行為，但是如果要更進一步分析中東歐國家（如波蘭）與其他國家（如英國與西班牙）採取此等行為背後動機的差異，我們將會發現波蘭與西班牙立場雖然接近，但動機卻不盡相同。西班牙在後冷戰時期所面臨的安全問題與波蘭並不相同，他們所面對的潛在威脅與對週遭的安全認知也大異其趣。

重新理解波蘭選擇該立場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是過去深刻的歷史記憶對波蘭認同的影響，此種深刻的歷史記憶將會引導波蘭人自行對現狀的發展進行解讀。美國對伊拉克動武此一事件對波蘭的安全環境衝擊是以間接方式表現出來，動武本身並不會影響波蘭的東鄰安全顧慮，或是削弱波蘭的安全防衛能力，但是美國和其他西方盟國長期以來的合作立場出現重大分裂卻會導致波蘭重新喚起那段國土被瓜分、被外來強權侵占的歷史。波蘭前外交部長，目前仍活躍於波蘭政壇的Bronislaw Geremek在美歐

註④ *Financial Times*, 31 January 2003, p. 10

註⑤ *Financial Times*, 31 January 2003, p. 3; Polish News Bulletin, 20 February 2003, p. 1

註⑥ Roman Kuzniar, “Bezpieczenstwo-Realizm Oceny, Dylematy Polityki,” *Polska w Europie*, Vol. 41, No. 3 (2002), pp. 131~159.

於伊拉克事件上出現分裂態度時如此說道：

“While you, Western Europeans, were together with the Americans (during the Cold-War era), we, residents of Eastern Europe, could only dream of the Marshall plan or NATO membership. No wonder then today, mindful of times of captivity and totalitarianism, that we desir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onds between Europe and USA, not their weakening.”^⑦

唯有努力維繫歷史上和波蘭關係和睦（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協助下波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並且對波蘭領土毫無野心的海外霸權美國，波蘭才有實質的安全保證。而美歐分裂卻可能降低美國在歐洲的軍事能力與政治信賴度。

歷史記憶提供了波蘭政治精英施政動力來源，而決策的場域則提供了一個歷史記憶發揮效力的溫床。歐洲各國在後冷戰時期對週遭安全環境進行重新理解，並在此基礎上重新調整安全政策。冷戰結束後，一個普遍對歐洲後冷戰時期的安全環境認知是，大規模戰爭的預期心理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與各國切身相關的如走私、販毒、跨國犯罪與難民等問題。在失去明確敵人的角色牽制下，美國的核子保護傘逐漸失去效用，威脅歐洲國家最大安全顧慮不再是境外大規模的軍事攻擊；相對的，低密度與不對稱性威脅正日益升高，歐盟必須採取相應能力來滿足此種新型態威脅，與此相關的則是歐洲逐漸發展出自我的歐洲意識，提高歐盟自我的政治發展是其中一項正在浮現的過程，西歐國家的不斷整合與企圖發展獨立的軍事動員能力以展現自我意志正是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的主要特徵。^⑧在伊拉克事件上，美國與西方盟國對出兵與否的問題上意見相左，美國的中東政策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而非單純的圍堵政策，並同時配合「促進民主」的外交政策以直接改變伊拉克政權，^⑨但德法等國卻堅持需要聯合國授權的合法性地位。雙方出現認知上的分裂，此種分裂無法透過現有機制獲得解決，導致美國與德法等國間一連串的政策無法相互協調，在伊拉克事件上雙方立場分裂更為明顯。這一種美歐分裂也可以被解讀為「規範—信仰」分裂，雙方對於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認知不同（對國際制度與國際法規範的認知差距），並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下雙方選擇終止協商，美國決定拋棄對德法等國的說服工作。^⑩對中東歐國家而言，面臨後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安全夥伴間的分裂，復加上缺乏一個可供盟國間相互友善的溝通環境與理性說服的空間，導致大部分的中東歐國家被迫必須在二擇一的選項中作出決定，於是自冷戰結束以來逐漸融合的安全認同觀又向「高政治」與「硬安全」的

註⑦ 括號內為作者自行添加，請見 *Polish News Bulletin* (Warsaw), 07 April 2003, p. 1

註⑧ Sten Rynning, “Why not NATO? Military Plann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6, No. 1 (March 2003), pp. 53~72.

註⑨ Ted Galen Carpent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ecurity Strategy: Implications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6, No. 3 (October 2003), pp. 513.

註⑩ Alice Ackermann, “The Changing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A Social-Cultur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0, No. 1 (2003), pp. 121~136.

方向擺動。對波蘭而言，沒有模糊空間的表明立場是需要極高代價的，這一點，可以從波蘭選擇美國立場所需付出的代價來看，波蘭的主要外資與重要貿易夥伴都集中在歐陸，法國與德國又是執牛耳地位。由有甚者，波蘭甚至懷疑波蘭將可能因為立場親美的結果而導致波蘭被迫在降低未來歐盟財政分配比率，甚至若干朝陰謀論解釋的政客認為，法國提出的歐盟憲法草案中修訂尼斯條約的建議，其實就是出自對西班牙和波蘭的懲罰。^①與此相關的是我們可以發現波蘭的歐洲整合政策反對未來歐盟出現一個具實權的歐盟「總統」或「外交部長」，因為擔心此舉將把歐洲安全的決定權置於他人之手；^②同樣，波蘭也極力阻撓在歐盟內部可能顯現的反北約聯盟，從歐洲軍事總部的研擬到軍事事務人員的擴充，在在顯示出波蘭政府對上述議題的敏感性。

選擇立場雖然代價高昂，但華沙當局決策時卻鮮少顯露出猶疑的態度，距離伊拉克戰事爆發僅僅五天時間，華沙迅速宣佈願意派兵支援美國部隊。^③在戰事結束後，美國請求波蘭派兵支援伊拉克的穩定工作，波蘭政府也快速批准，並於九月一日正式接管伊拉克中南部地區。^④不顧代價高昂的原因主要還是來自於波蘭對東鄰威脅的判斷。雖然冷戰結束已經多年，俄國已朝民主化方向改革，並且早已宣佈放棄使用戰爭作為與西方國家解決爭端的主要手段，但是波蘭與俄國和解的關係始終未能如波蘭與德國關係和睦，這一點可以從波蘭諸多重要領導人持續發表的言論看出。大多數的波蘭政治精英普遍認為，俄國對中東歐國家仍存有野心，而此等企圖正是驅使波蘭必須更為傾向西方的動力來源。^⑤但是我們又需要留意的是，波蘭對東鄰威脅的認知態度也在改變之中，波蘭正逐步修正對東鄰威脅的認知方式（其中包含了對威脅的來源與方式，其實質表現在二〇〇〇年的波蘭國家安全戰略與相應的國防武力重整），一旦波蘭認為東鄰不再對波蘭領土具有野心，雙方使用武力的機會大幅降低，其外交安全作為將會逐步修正。

理解波蘭支持美國立場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信度」(credibility)的面向，作為新近西方盟國的成員，波蘭初期是以安全消費者的面貌呈現在歐洲安全體系。波蘭領土鄰接東方潛在威脅來源，雖然波蘭一度曾經是共產集團除蘇聯外擁有最大軍事力量的國家，但隨著冷戰結束，波蘭的國防武力逐漸無力更新，與美國採取同步軍事作

註① *Rzeczpospolita*, 1 December 2003, p. A1, A12.

註② *Gazeta Wyborcza*, 24 January 2003, p. 6; *Rzeczpospolita*, p. A4.

註③ 波蘭參與的部隊約 200 人，包含波蘭的特種部隊 (the Polish special forces unit, GROM)、潛水人員，以及後勤補給船 Konradmiral Xawery Carnecki，原先波蘭計劃派遣一排的化學兵赴土耳其執行消毒任務，但此項派遣並沒有獲得土耳其政府同意。*Rzeczpospolita*, 25 March 2003, p. A4.

註④ *Rzeczpospolita*, 04 September 2003, p. A5.

註⑤ 如遠自 1992 年波蘭部長會議主席 Hanna Suchocka 以及現今總統 Kwasniewski 都還持有此種看法。請見 Wojciech Kostecki,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the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Warsa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996), p. 115; *Polski Przegląd Dyplomatyczny*, No. 1 (1) 2001, p. 12.

為的能力日漸顯現差距。^⑥同時，過去冷戰時期進行大規模軍事對抗的戰略指導方針與軍事部署也已經不符目前國防建設的指導方向，後冷戰時期所強調的武裝部隊多樣化（為應付承平時時期緊急狀況所需）、積極軍事行動（可能進行境外作戰）、足夠與盟軍進行組織與科技能力協調配合的能力（著重武器生命週期循環與盟軍的訓練合作），以及重新擬定防禦指導方針（加強邊境守備，內部建立拳頭部隊）成為波蘭目前重要的國防建設項目。基於此，波蘭安全急需北約作為波蘭國防轉形期的重要支柱，而如果波蘭僅僅以安全消費者的面貌出現在北約的軍事合作體系而缺乏積極參與的行動，則華沙不僅可能間接促進北約的邊緣化，同時也會因為信度不足的原因而排擠北約在面對可能軍事潛在威脅時的判斷依據。^⑦這一種強調因為信賴感與可信度的外交行為模式而導致華沙政府支持若干行動的表現並非首次，在過去的歷史經驗裡，華沙處理科索沃危機與積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表現，充分說明波蘭對於國際安全與穩定的任務採取支持的做法。從過去經驗表明，華沙政府體認到外交安全政策的「不作為」將可能再度導致盟國對危機處理的誤判，進而使盟國採取保守謹慎的安全政策，以此則可能嚴重妨害波蘭的國家利益。因此，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讓美國與北約體認到波蘭在面對軍事威脅時的堅定態度，讓盟軍與對手清晰而完整的了解華沙政府所即將採取的行動與政策。

從波蘭在此次美歐分裂選擇的立場來看，華沙當局無疑是在進行一項豪賭，華沙希望將安全議題置於冷戰時期傳統的安全體系下，並同時向西歐尋求國家發展與改革動力，從樂觀預期的面向來看，擁有一個硬安全的北約軍事保證與軟安全的歐盟體系的確可以為波蘭提供絕佳的安全環境，不過，波蘭面臨的認同分裂問題也不容忽視，向外積極與美國建立緊密的安全與軍事面向合作出現在大多數政治知識份子的論述內容，同時該項政策也符合公眾的安全期待心態，但面臨歐盟不斷增長的自我意識發展與逐日遞增的軍事動員能力，波蘭潛存認同上的混亂，未來波蘭如何在此種交雜的混亂情節中找尋自我定位將是重要挑戰。

伍、結 論

一、首先，就後冷戰時期波蘭的安全政策演變來看，波蘭一九八九年後的國內政治體制與對外政策發展均出現重大變革，此種變革不僅僅是手段性的變通，並且還牽涉了根本性的變化。除了拋棄馬列主義意識型態的包袱外，波蘭安全認同變革轉化還來自於一股由內而外，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並經由遊說/被遊說模式達成：無論是國

註^⑥ 在冷戰高峰時期，波蘭擁有將進 40 萬軍隊與超過 2800 輛各型裝甲車，以及 500 架各型蘇聯米格戰機。這個數字僅次於蘇聯，並成為共產集團對抗西方民主陣營的重要支柱。

註^⑦ 關於此點，波蘭內部湧現的政治爭議突顯了華沙政府在決定國防更新與社會建設的雙重困境。支持者認為，進行國防武力設備的更新刻不容緩，提昇如防空武力（採購美國先進戰機）與建立軍事協同指揮能力應成為外交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標；反對者則宣稱，鑒於出現大規模戰爭機率的預期心理大幅降低，政府應該投注更多心力於社會建設之上。*Poland Monthly*, No. 11, Jan. 2003, p. 31

內政治體制民主化與非共化的改革過程，亦或對外安全政策主軸的重大轉折（由脫離華沙公約組織轉而加入北約與歐盟），處處可見持不同意見者以說服的態度企圖說服對方。在面臨冷戰結束初期的不確定環境中，由於波蘭政治精英仍恐懼外在威脅（無法預知蘇聯坦克是否將會如一九六八年鎮壓布拉格之春般的開進華沙市區），因此改革的幅度較小。殆至蘇聯撤軍、華沙公約瓦解，以及隨後蘇聯的垮台，波蘭安全政策才出現明顯變化，就此點而言，安全認同的轉變的確先於政策之前，但受制於外在環境約束，認同轉變的顯現與政策間存在「時間差」，認同轉變的表現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出現後才能完整的顯露出來，但無論從國內政治發展的軌跡或安全政策變遷的端倪來看，波蘭安全認同的變化早已潛存在認知模式之中。從另一個方向來看，在冷戰結束初期的不確定環境中，執政者與在野者均接受了以遊說方式獲得公眾支持作為政府施政的合法性所在，執政初期的團結工聯組織與共黨政府願意舉行圓桌談判與願意遵守大選結果就是體會到政府合法性來源基礎已經有別於共黨時期，以傳統的武力鎮壓方式將無法獲得公眾支持，此種由內政發展習得的說服經驗同樣的也被緣引到對外的安全政策上，冷戰結束後華沙重新與西方國家交往，並在此基礎上接受了西方國家間已經進行數十年的溝通協商模式。在此環境下，波蘭接受了新的安全認同觀念，這當中涵蓋了對威脅來源重新定義、對尋求爭議的解決途徑，以及對安全認同的重新理解。

二、從波蘭加入歐盟的例子來看，正是由於波蘭（社會地位較低一級）企圖想要加入歐盟（社會地位較高一級）以獲取更高的身分認同，因此雙方互動模式進行順利，雙方除在若干敏感議題上存有歧見外（如農業補助款與調適期等），波蘭願意全然遵守歐盟的法律規範。但波蘭又不單純是規範的接受者，波蘭還希望成為規範的共同創造者，波蘭想要在未來的歐盟發展道路上添加更多屬於自己的色彩，這種態度也同時說明了一個甫自共產陣營解放的國家想要保有主權獨立的企圖。從理論的面向來看，單純的學習理論不足以說明波蘭的西化道路與安全認同變革，決策者在接受社會化（歐盟一體化）的過程中也同時注意到保有自己特色的重要性，因為決策者本身追求的目標之中就已經含有物質與非物質的層次在內，因此這種社會認同並非單純的模仿。同時，社會認同轉化發生的場域也值得深思，波蘭的例子表明，藉由社會化的學習過程被遊說者得以重新認識利益所在，並藉此重新調整偏好順序，遊說與被遊說者透過宣傳、鼓吹、說服的機制來重新調整底線。從更高的一個角度來看，波蘭加入歐盟的過程不僅獲得利益的滿足，同時也取得了身分地位的表徵，以及內化的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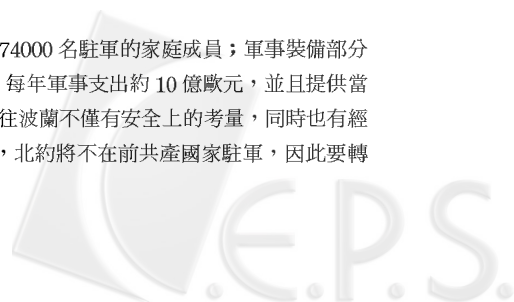
三、波蘭面臨美歐合作立場分裂迫使波蘭必須採取鮮明立場，並同時導致波蘭安全認同暫時割裂。從波蘭政治精英與一般大眾的民意調查分析來看，儘管歷經十餘年的轉變過程，波蘭民族對過去歷史仍保有鮮明記憶，因此每當國際局勢出現重大改變，波蘭民族仍不免將目前的政治局勢與過去歷史相類比，並從中尋找應變之道。短期來看，為了鞏固美國在歐洲的地位，本文相信，波蘭當然希望北約能夠繼續維持在歐洲的影響力，如果按照目前歐洲發展局勢來看，縱使美歐歧見日益加深，若干美國在西歐的重要盟國逐漸退出與華盛頓的軍事合作關係，華沙也不至於加入西歐的抗衡美國

集團，目前華沙正盤算如何加緊與北約的軍事關係，其中一個選項就是如果北約退出駐紮在德國的軍隊，華沙將爭取美軍遷移於波蘭境內。^⑧另外，假如北約逐漸失去實際效用，華沙政府也正盤算如何加強建立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前文已經提過，如果絕非必要，波蘭絕對不會願意在美歐分裂問題上表明態度，因為支持美國的立場將可能有害未來波蘭在歐盟的競爭地位，包括對外資的吸引、歐盟財政的分配比率、或者是波蘭在未來歐盟憲法草案的決策機制地位等問題。美國與德法等國在伊拉克問題上毫不妥協的立場正說明了波蘭的被迫表明立場肇因於缺乏一個雙方互賴的溝通基礎，相關各造無法在一個相對溫和的環境中進行說服過程，最終訴諸立場表明結果就是政治精英被迫尋找政府施政的慰藉，在此關鍵時刻，歷史記憶的作用自動為現狀進行詮釋，並引導政府朝向相對應的施政方向。但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從長期觀點來看，波蘭政治精英與一般公眾所具有的安全認同觀念已經深植人心，波蘭與歐盟整合的過程中更為確實的遵守法律規範與更為謹慎的使用武力將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另外，北約在後冷戰時期積極接納新會員的行動也可能直接促進歐洲東部的相對穩定，我們不妨想像未來假使北約納入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等國，波蘭的東鄰邊境壓力頓時減輕，我們將可能期待一個安全認同持續運作並向外發散影響力的作用，這幅景象在華沙的計劃之中，不過相關變數仍多，本文無法在此詳述。

* * *

（收件：92年12月1日，修正：93年2月9日，接受：93年4月16日）

註^⑧ 目前美國在德國駐軍 57000 人，另外有 13000 名後勤部隊以及 74000 名駐軍的家庭成員；軍事裝備部分則有 60 架的 F-16 戰機，12 架 A-10 攻擊直昇機，785 輛坦克。每年軍事支出約 10 億歐元，並且提供當地 1000 名德國聘僱人員的工作，因此對波蘭而言，爭取美軍前往波蘭不僅有安全上的考量，同時也有經濟上的助益，不過這項安全政策牽涉範圍仍廣，因為根據協議，北約將不在前共產國家駐軍，因此要轉移北約軍隊駐紮於波蘭境內，仍需更為細膩的政治手腕。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Policy Shifts—Poland's Security Environment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San-yi Yang

Ph.D. Candid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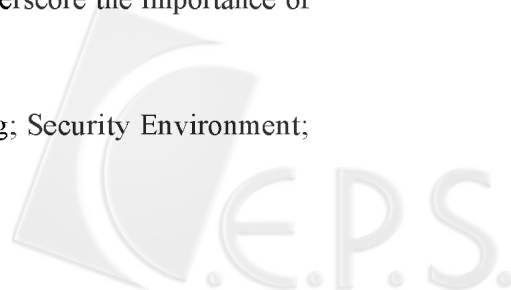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Warsaw

Abstrac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de-communism" processes in Poland is hallmarked by the post-Cold War collapse of East-West confrontation.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olish population's collective memory, Poland is still preoccupied with survival, power, and security; moreover,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tied in with balance-of-power theory has its clout on post-Cold War security environment. Nevertheless, rec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has tended toward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including internal historical-cultural constraints, external geopolitical and cost/benefit calculation constraints,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n security identity. These interpretations—whether they were termed extrovert and introvert security analyses—are sometimes necessitated by external circumstances, but may also be the result of endogenous factor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ecurity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is the primary tool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Poland's security policies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Adjustments of ends rather than means and adoption of higher-order goals characterizes complex cognitive learning, as opposed to tactical learning, which adopts more efficient means to reach the same unchanging goals. With recourse to three events: the security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1989 to 1992, Poland's road to the EU and the trans-Atlantic split, the author tries to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oland's security identity.

Keywords: Security Identity; Cognitive Learn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Security Policies



參考文獻

- Ackermann, Alice (2003), "The Changing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A Social-Cultur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0: 1, 121-136.
- Adler, Emanuel and Michael Barnett (1998),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mus, Ronald (2003),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an Age of New Uncertainty,"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4: 1, 6-15.
- Blazyca, George and Ryszard Rapacki (1991), *Poland into the 1990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reuning, Marijke, and John T. Ishiyama (1999), "Aiding the (Former) Enemy: Testing Explanations for Foreign Assistance to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SU,"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6, 357-371.
- Brown, Harold (1983), *Thin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 K.: Westview Press.
- Brumberg, Abraham (1983), *Poland: Genesis of a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arpenter, Ted and Barbara Corny (1998), *NATO Enlargement: Illusion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 Chesterman, Simon (2001), *Just War or Just Peac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pkowski, Peter (1991),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understanding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Poland, Hungary, East Germany, Czechoslovakia, Roman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Wiley.
- Elster, Jon (1996),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ftendorn, Hlega (1991),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 Building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
- Hall, Bruce (1999), *National Collective Identity—Social Construct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gg, Michael and Dominic Abrams (1988),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 London, U. K.: Routledge.
- Jepperson, Ronald,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1996),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3-75.
- Katzstein, Peter (1996),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y, Sean (1998), *NATO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Lanham, U. K.: Rowman

- & Littlefield.
- Kelstrup, Morten and Michael Williams (2000),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U. K.: Routledge.
- Khotkova, Helena (2001), "Russia's Relations with Central-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Beginning of a New Stage?"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11: 1, 75-81.
- Kiss, Laszlo (2003),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Foreign Policy Review*, 2: 1, 115-130.
- Krahmann, Elke (2003),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8: 1, 5-26.
- Kranz, Jerzy (2001), "Germany, Quo Vadis? A View from Poland," *German Politics*, 10: 1, 141-154.
- Kratochwil, Friedrich (1989),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zniar, Roman (2001),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1989-2000*, Warsaw, Poland: Scholar Publishing House.
- Kuzniar, Roman (2002), "Bezpieczenstwo-Realizm Oceny, Dylematy Polityki," *Polska w Europie*, 41: 3, 131-159.
- Levy, Jack (1994),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2, 279-312.
- Markowski, Radoslaw, and Edmund Wnuk-Lipinski (2001), *Transformative Path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arsaw, Poland: Instytut Studiów Politycznych Polskiej Akademii Nauk.
- Marusiak, Juraj (2001), "Poland as a Regional power and Polish-Slovak Relation,"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2: 1, 36-55.
- Mearsheimer, John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 5-56.
- Mizerski, Witold (2002), *Tablice Historyczne*, Warsaw, Poland: Wydawnictwo Adamantan.
- Moravcsik, Andrew, and Milada Vachudova (2002/2003), "National Interests, State Power, and EU Enlargement," *Perspectives*, 19, 21-31.
- Nelson, Daniel and Laura Neack (2002), *Glob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er*, London, U. 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Pernal, Marek, Tombinski, Jan and Wisniewski, Rafal (2001), *Kraje Europy Wyszehradzkiej przed wejściem do Unii Europejskiej-razem czy osobno? Polska w Europie*.
- Risse, Thomas (1997), "The Cold War's Endgame and German Unific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4, 159-185.
- Rynning, Sten (2003), "Why not NATO? Military Plann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 1, 53-72.

- Smith, Steve (2000),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n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U. K.: Routledge.
- Zubok, Vladislav (2003), "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Factor' i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198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2: 13, 5-23.
- , Defence Doctrine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arsaw*, 21 July 1990.
- ,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arsaw*, 23 May 2000.
- , Presidency Conclusions, Copenhagen European Council, *Brussels*, 12, 13 December 2003. Nr: 400/02.
- , Principles of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Warsaw*, 2 November 1992.
- , Poland's Security Policy and Defence Strategy, *Warsaw*, 2 November 1992.
- ,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arsaw*, 4 January 2000.
- ,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Poland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Withdrawing the Troop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the Territory of Poland, *Moscow*, 22 May 1992.

